

交谈

• 4 •

FREE TALKING FREE TALKING

自由

张志林 吴重庆 主编

四川文艺出版社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主 编 的 话

个人自由是社会健全的根本标志。一个健全的社会必有自由交谈的广阔空间。

本丛刊力显独立思索和真诚言说的风貌——这里没有学科之限，也无文体之拘，惟有深切的感受和无畏的探究；这里没有学术权威，也无思潮明星，惟有真知的追求者和社会的批评家。

栏目之设，皆依文稿。出版日期，随缘而定。敬请有识之士踊跃投稿。我们特别欢迎问题意识鲜明、思想交锋坦诚、论说方式独特的作品。

目 录

主编的话

B413.8 / f 01

1999 独白

- 六十岁的祈祷 叶秀山 (1)
世纪末思绪 梁治平 (13)
百年明日 博 凡 (18)

精彩序跋

世纪之交的圆桌会议

- 《1999 独白》总序 ... 萌 萌 (47)
发现另一个中国 李慎之 (50)

世纪漂泊

- 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 何清涟 (65)
戊戌变法百年祭 何清涟 (94)

《春秋》书法下的戊戌变法

..... 蒋 庆 (102)

珍藏文稿

梦想的中国

——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
未来的展望 林语堂等 (113)

名流探幽

爱因斯坦的人格、人性和人品

——纪念爱因斯坦诞辰 120 周年
..... 李醒民 (125)

文化广角

“生存”两个字好辛苦

——《中国出版：来一个深呼吸》续
..... 金 平 (142)

学者演讲

- 人间天上 张启正 (154)
告别海德格尔 彭富春 (159)

旧话重提

- 重温潘晓事件：十八年后的复信
..... 陈晓平 (168)
人生观讨论与现实人生
——一个当事者的人生感触
..... 赵 林 (186)

生死抉择

- 当代人的悲剧
——《思痛录》节选 韦君宜 (201)
化痛苦为智慧 曹念明 (209)

1999 独白

特约编者按：《1999 独白》卷一、卷二即将问世，预计卷三、卷四、卷五，也将在 1999 年至 2000 年陆续出版。宗旨始终如一：“打捞思想，立此存照”，而形式依然是“独白”中的区分和互补。我们并不奢望完整——对每一个人和他经历的时代，我们只希望有自己的问题和真实的关切：他付出了，他获得了，他表达了。

《自由交谈》从本辑开始，陆续选载《1999 独白》中的部分文稿。世纪之交能读到文化人心灵的畅想与告白，实在不易。我们愿与读者共遐想。

萌 萌

1998 年 12 月 4 日

六十岁的祈祷

·叶秀山·

这年——1996年一过，我都六十二岁了，在某些聚会中，老同事、老朋友还叫我“小叶”，而那些不相识的年轻人竟有叫我“叶老”的，弄得我只能以哈哈大笑来解嘲。我希望我永远能做“小字辈”，或者永远能被叫“小叶”，因为这意味着我永远拥有“老朋友”，祝他们健康长寿，即使我不在时，当他们回忆起我来，仍然叫我“小叶”。

的确，年过花甲，死了也不算“夭亡”。王国维五十岁就死了；如果我也在五十岁那年死了，我固然不敢狂妄地说“天下遂不知有个叶秀山”，但至少现在这篇文章是写不成了。

然而，如果真有什么“部门”、“大官”管寿命的，我倒要向他们提出一份申请，或叫“提案”也行，请他们批准我们这一代人能延长在地球上的居留期，我的理由是：我们这代人被耽误了太多的时间，受到很多的干

扰，学问根底太浅，有关“部门”应把亏欠我们的时间还给我们。

过去的年月，我也不用再算细账了，不但我自己说过，许多同事和朋友也都在不同场合、以不同方式说过各自的体会，而更有一些作家，把这个时代写成了小说，流传于世，深入人心。总起来一句话，我们这代人学问基础相对地差一些。

当然，我不能说，我们这代人都不行。不能因为自己不成器，拉着别人一起下水。我们这代人中自然有各种类型的代表人物，大学问家也是有的，他们一直是我学习、羡慕的榜样。

然而，我还是要告诉你们，或者偷偷地告诉你们：我们这代人——或加以限制：当然包括我在内的相当一部分人，在学问上是长不大的人。在这一点上，至少我本人真的永远是“小字辈”。

我说这话，一点没有要谦虚的意思，也不是要强调“永葆学术青春”之类的哲理，而是一句大实话。

几十年前，贺麟先生跟我说，做研究工作，三十岁前看“聪明”，三十岁后要看“学问”。我当时不到三十岁，所以贺先生才对我说这话的；如今我六十多岁了，“学问”又如何？

我的专业是“西方哲学”，按这个专业的要求，我学了几种外语，程度不等，但都谈不到“好”，勉强读读书，有的也只能参考参考，不能独立应用的；西方哲学史上的原著读过一些，有些断代也作过点研究，但我告诉你们，书太多了，读不过来。有的书过去明明读

过，而且是仔细读过了的，现在再来读，好像初次见面一样。倒不是记性不好，而是当初没有读懂。譬如，斯宾诺莎的《伦理学》是贺先生译的，他根据拉丁原文校过，我也对照拉丁文本读过，不谓不仔细了，但前不久拿来读，大为惊讶，为什么过去竟没有注意那些“道理”？！过了些日子，拿起费尔巴哈的书来念，有时还对照德文读读，大为赞赏我们老师的译笔——记得经王太庆先生校过的，不但信实，而且优美、流畅，把费尔巴哈的文风表达得很好，同时也怪自己，为什么过去不好好读它，以至于有一个“费尔巴哈较为浅显”的观念！

还有那培根的书、莱布尼兹的书……过去都读过的，现在想起来惶恐得很，肯定是没有读懂！于是又想一本一本去读它们，但是哪里还有那许多“时间”！

康德、黑格尔的书是我比较熟习的，也常常反复读一些段落，一直没有“丢生”；但说也奇怪，每次想“参考”一下其中的章节，读着读着，又想把全书甚至他们其他的书都要读一遍才好，然而，又是那句话，哪有那许多的“时间”！

更不用说，还有那过去没有读过的书，而这些书，研究西方哲学的理应都要读的，很懊悔年轻时未曾多读些书。

当然，我有时也和朋友们作些自我解嘲的排解工夫：我说，有些书“读早了”，不如“读巧了”，有些书的确感到“读早了”。十七八岁的娃娃读《资本论》，不容易领会，二十多岁的人读斯宾诺莎、莱布尼兹的书也不容易懂的。

然而，当你似乎能读懂时，何人又给你“时间”来读？

何况，“西方哲学”除了“历史”以外，还有“现状”。如今是“信息”时代，资料的传播快如风云；而且如今又是“群众”的时代（后现代？），几乎人人都可以写书，都有一得之见，谁敢“忽略不计”？八十年代风气初开，大量西方信息涌入，我和所内一位青年学者说，我和你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几乎是同时起步的，可是老年人要和你们在同一个起跑点上比赛，非累死不可。

再说中国的学问。我的专业是“西方哲学”，但是中国人来做的，自然要有“中国特色”，然而，我们这一代人中相当一部分（限制一下好），尤其是做西方哲学的，中国学问的根基，可以说几乎是一张白纸。

首先，说一句该忏悔的话，我们做西方哲学的在过去都不大看得上中国哲学，不是说中国哲学不是学问，它当然是很高深的；但它不大像“哲学”。于是，研究中国哲学倒是要掌握一定的西方哲学的知识；而研究西方哲学的却可以“名正言顺”地不读中国哲学的书。在大学读书时，实在是张岱年先生课讲得太好了，我背他的讲稿，考试也能得个好成绩，至于中国哲学的原著，在校期间则没有读过。

不过，对于中国的文学艺术，我还是很有兴趣的。不读中国哲学的书只是认为它不像“哲学”，而中国是个诗的国家，中国的诗、书、画、戏曲都有极高的水平，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，所以我一直对这些艺术有很

大的兴趣。贺先生知道我的兴趣，时不时还送我一些他买重了的法帖，但对于我能不能做一点中国学问，却未置可否。有一次他对我说，他们这一代人从小都有中国学问的基础，在接受了西方文化教育以后，转而研究中国学问，就比较自然、顺当，下面的意思他没有说出来，我的领会是：像我们这代人，从小没有中国学问的训练，不大容易研究中国的学问。贺先生说得很对，我从小没有上过“私塾”，学校里学的是物理、化学、生物（自然）、历史、地理等“新学科”，当然也学点古文，但零零散散，作为“基础”，就太薄弱了。

所以，中国学问这一课，还得从头补习，而中外的学问都一样，许多书不是一遍、两遍就能读懂的。过去人们看不上那摇头晃脑背“四书五经”的“老冬烘”，其实，真的要能体悟出些自家的东西来，还真的要摇不少次脑袋才能“出”得来的。所以，当有朋友问我要不要做点中国的学问时，我总不敢正面回答，而以“谈何容易”表白自己的心态。

对于读中外古人的书，我不大采用“审案”的办法，即用自己现成的一套套古人（他人）的学说，不会的则“划”为什么什么主义，而倾向于从体会古人的意思中引发出自己的意思来，所以侧重点不在建构自己的“体系”，而在于体会“他人”的意思，努力把握古人真正的思想。我相信，有了这番工夫，真正把古人的思想弄懂了，“自己”的“意思”会自然而然地引发出来的。我感到，这样引发出来的东西，就既不委曲、误解古人，也定会是不同于古人的。我们毕竟生活在现代，我

们受的教育、处的环境、个人的经历都不同于古人，对问题的看法也就不会与古人完全一样。

我把这个意思再说得具体点：我们研究古人的思想，要做到这样的地步：如果古人要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他（们）会是怎样想的。也就是说，根据他（们）的“思路”（理解），他（们）如果在现代，对某某他（们）过去讨论过、想过的问题，也会有新的阐发、新的思想、新的想法的。

这些新东西，也许和过去的完全不同，或者是过去的否定，或者是修改、发展，但“精神”却是一贯的：都在探求“真理”。我相信，这样引发出来的思想，既是“新”的，又是言之有“据”的。

这就是说，“学术”应有自己的“生命”，“学术的生命”大于“个人的生命”。并不是说，“学术”没有“断裂”的时候，其实，我们这一代人恰恰就是处在一个“学术”的“断裂层（带）”中。扩大开来说，“学术”也经常处于这种“断裂层（带）”中。中国学问讲“传统”，还好一点；而西方的学问则常常要“反传统”，要将过去的“传统”（在西方哲学是“形而上学”传统）都批判掉，彻底绝裂等等，但往往“断裂”是为了更广泛、更深人的“延续”，由旧传统开启一个新传统。其实，西方那些“后现代主义者”或“解构学家”，大都是饱学之士，他们“解”这，“解”那，没有学问则只是一股激情，或是一种“聪明”——像贺先生说的，在做“三十岁以前”人做的事，而谈不到“学术”、“学问”。

所以，要做“三十岁以后”的“学术”、“学问”的工作，就又得先读大量的书，读古人的著作；而中国如此悠久的历史，涌现如此众多的有才学之士，应读的“书”真是浩如烟海，过去是“视而不见”，如今只剩下“望而生畏”、“望洋（书）兴叹”了。

不仅如此，学哲学的人兴趣又特别广泛，什么都想“知道”，都想“弄懂”它，不仅人文社会现象，就连那日月山川的自然现象，也都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。

按传统哲学的观念，“哲学”研究“无限”，“无限”就是“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”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“限制”“它”。所以，在某种意义上，“哲学家”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“专（门）家”，而常常是一个“通才”、“通家”。

我上大学时，是解放后院系调整后的第一年，那时哲学系分三个专业：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和逻辑。我选了“自然科学”作专业，所以学了“高等数学”、“物理学”、“化学”、“生物学”等课程，虽然分数记录逐年下降，但也可以看出我年轻时的意向。

至今我还是很想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，手边经常放一些这方面的书，表示阅读的决心，但就是没有时间。好几年前，我读了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合写的《物理学的进化》激动不已，觉得大科学家们竟能将深奥的科学问题如此深入浅出地表述出来，足见科学的道理是要人明白，而不是让人糊涂，当时想写一篇读后感，但实在自知基础太差，未敢动笔。

我还一直想补习中学的数理化课程，有一套这方面

的“自学丛书”，一直放在我家中书架的“前沿”，不把它们“束诸高阁”。我这个非分的想法，是因为有杨向奎先生的典范在鼓励着我。杨先生早已是知名历史学家，曾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，但居然发奋攻读物理、数学方面的书。他告诉我，起初竟从中学的课本入手，后来进入高等阶段，慢慢能与爱因斯坦、海森堡诸家对话，不但在他研究古代思想史的文章中运用严格自然科学新观点，无人能及，而且能直接对相对论所涉问题发表意见。我有幸和杨老先生住在一个大院多年，至今还经常读到他的新作。杨先生的学问对我说来是难以企及了，但他的精神我是一定要学的。

与此有关的，是“逻辑”这门学问，这本来是搞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训练，但如今却似乎各自“分家”了。在大学分专业时，从南方来的几个同学劝我跟他们一起选“逻辑”专业，我没有做，他们现在都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有两位和我一起在哲学所工作了很多年。我对他们很尊敬，因为他们都学有专长，其中有的朋友还很有哲学头脑。我常劝他们，年纪大了，不要专门的逻辑，而要扩展开来做哲学；对我自己，则老想从头至尾好好地学“数理逻辑”，包括做习题在内。他们的书，更一直是放在了我小写作间的“前沿”，表示学习决心之大；但却断断续续，未能持之以恒，故而事倍功半。前些日子，我的课题做到了亚里士多德部分，我决心不避开他的“工具论”，围绕这个问题，学了一些逻辑皮毛，勉强将这部分写了出来，但自知远远不够，所以那一批占据书架“前沿”的书，不敢撤下来。